

新書出版



書名：十年踽踽——汪維藩文集 (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

作者：汪維藩
系列：景風叢書 第十六種
出版社：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ISBN：978-962-7706-20-5
規格：544頁/ 148 x 210 mm/ 平裝
售價：HK\$130

推介

很高興知道汪維藩牧師的書《十年踽踽》即將出版：這書雖只收集了他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年的文章，但從中可以看到他早年受內地會楊紹唐牧師的教導，又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汪牧師博覽群書，有信仰的堅持，為人忠誠，又經歷中國教會過往六十年的歷練，是中國教會少有的大師級牧者及神學家。

國際福音證主協會 薛孔奇

汪維藩老師是文革後中國教會重新恢復後的第一批神學教育工作者……在教會恢復後的十多年，出版了大量討論中國基督教和本色神學的文章及書籍，對培育神學生，教會及神學思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和貢獻。

本書所收錄的，正是老師在剛過去十年所經歷、所思考的重要課題及文章，對我們認識當前的中國社會、教會及其神學非常有幫助。尤其關於聖經在中國神學思想建設中的重要性——這是目前最需要探討的範疇，老師在這方面的意見與看法，非常值得參考。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 盧龍光

在今天的中國教會內，曾經見證着新舊時代更替的人物，絕對是寥寥可數。而汪維藩牧師大抵是其中一位。

我所指的「跨時代」，既是指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政治及社會巨變，亦同時指文革後翻天覆地的變革……汪維藩牧師不僅是一位牧者及教師，還一直關心中國神學與文化的相關課題，並撰寫了大量著述，堪稱中國教會內少有的「學者」……在他身上，我隱隱看見昔日中國教會史上許多心繫教會與時代的知識分子及神學家的影子與腳蹤。

《十年踽踽》既可讓我們窺探到近十年間密切影響中國教會發展的時代議題，也能掌握若干華人教會長期關注的重要課題。汪牧師的思考，對中國神學本色化工作，無疑有重大的貢獻。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副社長 邢福增

作者簡介

汪維藩，牧師，教授。一九二七年生，江蘇省泰州市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肄業三年，杭州中國神學院/金陵協和神學院一九五五年畢業。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鎮江浸會傳道，一九五七至五八年南京《聖光》編輯。一九五八至七九年，於「反右」、「文革」運動中受衝擊，後期在工廠中勞動八年。一九七九年，調至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一九八一年金陵協和神學院復校後，任教學、文字出版等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

新書預告

繼《十年踽踽》之後，宗文社將推出汪維藩牧師另一文集《廿載滄茫》，收錄汪著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年的文章。內容包括中國宗教問題研究、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探索、「三自」問題之思考及散文、序跋等等。

內容簡介

《十年踽踽》記錄了汪維藩牧師自一九九七年起十年間的心跡，內容從中國人如何讀經、傳統文化與神學的整合、中國基督教的人和事、教會歷史，以至社會議題和宗教政策等，均有討論。其中不少曾於《金陵神學誌》、《天風》、《研究動態》及《當代宗教研究》等刊物發表過。汪氏學養豐厚、文字情理兼備，其對神學教育和本色化的堅持、對教會的關切和情愫，令每位曾與其相遇的後輩和讀者都心悅誠服。

自序

《十年踽踽》的「十年」，指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我虛度七十至八十的十年。「踽踽」，獨行貌；《詩》云：「踽踽獨行」也。故爾，十年一部文集所留下的，是我晚年獨自品嚐的一縷心緒，獨自走過的一程心路。

聖言至上或聖經至上，是改教三原則之一。神學思考必須源於聖經，基於聖經，本於聖經。不以聖經為本源、為根基的神學，必若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對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世上萬族的人均可揣摩而得。中華民族的得天獨厚，乃在上帝所賜的「大易思維模式」及「內涵型邏輯」。在處理愛神與愛人、出世與入世、靈修與服務、信心與行為等等範疇時，不少人每每從一個片面走向另一片面，或從一個極端又走向另一極端。問題的癥結，均在於陷入「二元對立論」，未能遵循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思路。「凡密契工夫越深湛者，其服務活力必越白熱化。反之，凡服務功能越崇高而廣博，必因其密契已達爐火純青」（謝扶雅語）。道不離器，器不離道；道器不離，此之謂也。

中國的學問，不僅是一種記誦之學，更是一種踐履之學——一種源於心靈的踐履之學。中國神學並不排斥理性和思辨，但撲面而來的，首先當是心性與精神，以及對家國的情懷和對聖教會的依歸。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說過：「宗教本身既無本質，也無王國。」據此可以說，神學既不姓「資」，也不姓「社」。由於「『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語），反映為不同神學觀念與傾向的基因，亦深藏於社會本身。故爾，神學家必須首先將百姓的疾苦、艱難、平安、歡樂，帶到上帝寶座之前；而後將上帝的憐憫、看顧、勸慰、恩言，帶回人世之間。神學，既不是王后，也不是婢女；既不嫉世，也不媚俗。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中國某些學者一度鼓吹「宗教觀念的變革」。依據之一，是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一八

五零年的一句話：「隨着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生變革。」認為社會主義中國也該發動一場宗教觀念的變革，是對上述引文的誤解。首先，馬、恩的話談到的是近兩千年前的羅馬歷史，而非社會主義社會處理宗教問題的原則；其二，馬、恩旨在陳述羅馬社會崩潰與基督教誕生之間的社會因果，而非號召一場宗教觀念改革的意識形態運動；其三，馬、恩批評的對象，正是那位原為社會主義編纂《新時代的宗教》的道梅爾先生（Georg Friedrich Daumer, 1800—1875）；其四，馬、恩認為，社會主義變革不需要利用宗教。他們說：「現在的變革……拋棄一切宗教」。這是緊接上文引語的一句話，意在明確宣稱：社會主義變革有別於歷史上任何其他變革，不再需要任何宗教作旗幟、作外衣、作平台、作依據。

面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現實，片面強調愛的上帝而淡化其公義、公正與威嚴之屬性；片面強調教會的道德與服務功能而淡化其精神、信仰與靈性之內核；片面強調人生之世俗與現世意義而淡化其超卓、終極與永恆之層面；熱衷於為現行政策作概念式的「神學注解」，卻對中央所關注的社會、民生實際問題，對教會權益受損害的切身問題，不建真言、不獻良策。如此等等，令人很難不聯想起馬、恩所批評的《新時代的宗教》，以及上海一位已故學者所曾預見的「社會主義神學」（蕭志恬語）。

約在六十年前，周恩來講過：「讓宗教還它個本來面目。」神學，也當還它個本來面目，還原為教會與社會之良心，還原為一股「天上飛來的清風」（吳耀宗語）。

《十年踽踽》得在香港面世，謹向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各位同工致謝，特別是邢福增先生和吳秀麗女士。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盧龍光院長和邢福增先生賜〈序〉，不勝感荷。

汪維藩

二零零九年三月